

論地理環境在 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沃斯卡年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論地理學教科書 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 鄭麗華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11年1月號）

論地理環境在 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沃斯卡年著

鍾元昭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五八年·北京

А•М•Восканян
О РОЛ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СРЕДЫ
В РАЗВИТИИ ОБЩЕСТ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 Арм ССР
Ереван, 1956.
根据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译出

論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苏]沃斯卡年著
鍾元昭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
北京商標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787×1092公厘 $\frac{1}{33}$ 印張 $5\frac{5}{8}$ 字數113,000

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3,000—00,000 定價(七)0.56元
統一書號12002·56

目 次

第一章	資产阶级社会学中的地理学派的唯心主义本質和反动本質	1
第二章	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地理環境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學說	32
第三章	地理環境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和意义	88
第四章	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期对苏联地理環境的改造	149

第一章

資產階級社會學中的地理學派的 唯心主義本質和反動本質

I

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前，人們始終未能以正確的觀點來對待地理環境在社會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有一些人完全否定地理條件的作用；另一些人則把地理環境看成是絕對的，認為歷史發展的整個進程正可以用地理環境的決定性作用來加以說明。

遠在古代就已出現了持後一種見解的代表人物——社會學中地理學派的代表者。例如希波革拉第（紀元前460—377年）就錯誤地認為，人的性格是由氣候特點決定的。他談到亞洲溫帶國家時，會這樣寫道：正是這些國家的氣候條件，使這些國家的居民不可能是堅毅果斷的和富有力氣的，正是氣候條件使他們不能夠堅持緊張的勞動和保持堅忍不拔的毅力；如果說亞洲人似乎很懦弱，他們的特點是缺乏英雄氣概和尚武精神，並且具有比歐洲人來得順從的性格的話，那末應當在氣候的特點中去尋求它的主要原因。

此外，柏拉圖（公元前428—348）也會發表過類似而不正確的見解，當他從貴族階級的立場批評商人的時候，會這樣寫道：“……海洋使市民的心靈充滿了生意人的氣質和商人的自私自利心理，使市民沾染上好撒謊和不誠實的性格，……使他們成為對誠實以及彼此信賴或信賴別人的心情格格不入。”阿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也會說過：

“欧洲北部寒冷地带的民族虽然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但是並不很聪明机智；因此，他們虽仍然保持着独立，但是缺乏政治生活，不善於统治邻近的民族。南亚洲热带地区的民族，虽然十分聪明，但是欠缺勇敢的精神，因此永远处在从属和被奴役的地位。希腊人，由於生活在温和的气候下，所以具有各种各样的优点，如勇敢的精神和莫大的智慧等等；因此，他們富有独立自主的精神，願意从事於政治生活並且能够統治别的民族。”

奴隶社会的理論家們正是以諸如此类的見解来作为某一民族統治另一民族的理論根据的。

我們在下面将要談到地理学派稍后一点的某些代表人物同样也重复和發揮了希波革拉第、柏拉图和 阿里士多德的这些看法中的很多論点。

十六世紀法国学者波当(Jaen Bodin)同样也談到了气候的决定性作用，他會經企图从地理环境、主要是从气候和土壤(照他看来人与人之間的差別是由气候和土壤所决定的)中推断出社会的特点，并且肯定地認為国家的政治机构应当适应於气候和土壤的条件。

但是地理学派是从十八世紀才开始广泛流行的。这一点同資本主义关系在欧洲的发展有关。由於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由於机器技术的发展，同时也由於地理大发现时期以后欧洲的資本活动場所的空前扩大，資本主义的进步思想家日益深刻地理解到应当用地理环境来进一步发展經濟的必要性。

十七——十八世紀的社会学中的地理学派，是在 封 建社会內部成长起来的資产阶级意識形态的表現之一，它曾經激烈地反对封建主义唯神論的世界觀。这种較比进步的

新思想的保卫者和喉舌們企图用自然界和自然力来解釋各種現象和事物，並用自己这种解釋来反对那些通过神來解釋各種現象和事物的中世紀唯神論的觀點。这无疑是一种想要从自然界出发、想要摆脱超自然因素而來解釋历史发展規律的企图。地理学派在其发展初期的进步方面，就在於此。

十八世紀社会学的地理学派中的最大代表人物是法国历史学家兼法学家孟德斯鳩(1689—1755年)，他曾經写了一本有名的著作“論法律精神”，这本著作为当时社会学中的地理学派打下了基础。

孟德斯鳩認為人們的性格、性情和喜好取决於这个国家的气候条件，而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人民的生活方式、法律、政治制度，甚至自由的发展程度則取决於人民的性格、性情和喜好。由此可見，孟德斯鳩是把地理环境要素之一的气候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决定要素。

孟德斯鳩認為，生长在寒冷气候的人們比較剛強，他們有很大的自信心，比較勇敢，有很大的优越感，他們不太多疑，不善於玩政治手腕並且不很狡猾。热带地区的人民像老年人那样畏縮不前。寒带地区的人民則像年青人那样勇往直前。在热带地区的国家里，犯罪事件往往隨情慾的加强而倍增，每一个人都极力想在一切事情上超过別人，因为这样才能使这种情慾得到滿足。

居住在過於炎热气候的人对一切事情都很冷淡，都不感兴趣，他們既不会有任何光明磊落的行为，也不会做出任何寬宏大量的事情，他們宁可忍受懲罰，也不願工作。

孟德斯鳩不仅用气候特点来解釋人們的道德品質，而且如上面所說甚至也用气候特点来解釋它們社会生活的性

質。他認為，人們生活方式的不同是由於人們需要的不同，從而也引起法律上的不同，而需要的不同則是由於氣候特點所引起，因此他錯誤地武斷說：“熱帶民族的怯懦往往促使他們走上奴隸順從的道路，而寒帶民族的強悍則使他們保持自由的地位。”^①

孟德斯鳩的唯氣候論（在其著作的另一處地方這樣寫道：“……氣候的威力是世界上最高的威力”^②），儘管有其相對的進步性，但是即使在它的萌芽時期，就已包藏著許多反動結論的因素，如關於種族優劣和種族不平等以及熱帶民族的淪為奴隸和灭亡乃是這些民族的自然狀況等一類反動結論的因素，這類結論早已遭到法國十八世紀的唯物主義者的批評，他們曾經指出：地理學派的理論懷孕著種族主義的傾向並且能夠被用來證明殖民地掠奪和對殖民地國家人民的奴役是合理的。法國十八世紀的唯物主義者認為，地理環境不能是社會發展的主要原因。例如愛爾法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就曾經出來反對孟德斯鳩的唯地理論，他堅決地駁斥了這種把氣候看作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的看法^③，並指出說，這種理論孕育著孟德斯鳩本人並未作出的仇視人類的結論^④。實際上，正如愛爾法修所指出，如果東方民族的後果真由東方國家的熱帶氣候決定的話，那末豈不是說這種後退就是命定的，是無可挽救的了。但是即使是法國唯物主義者本身，尤其是愛爾法修本人，正如大家所知道，對於歷史發展的看法也並未越出唯心主義

① 孟德斯鳩：“論法律精神”，聖彼得堡，1900年，潘漢李也夫版，第270—271頁。

② 同上書，第301頁。

③ 參看愛爾法修：“論智慧”，莫斯科，1938年，第249—250頁。

④ 同上書，第263頁。

界限。例如爱尔法修曾經用人口决定論来反对孟德斯鳩的地理环境决定論，而人口决定論的錯誤程度並不亞於地理环境决定論。

当然絕不應該对孟德斯鳩的學說作簡單的評價。必須指出，孟德斯鳩談到气候的决定作用时，曾同时指出說，在某一国家里，法律如果同气候、从而同人民的性情以及性格不相适应的話，那末就必须根据人民的性格和气候来加以改变。从这句話中我們不难看到这一类思想的进步的反封建傾向。

在地理学理論中已具萌芽状态的这些反动思想，进一步发展以后，就以特殊的力量出現在資本主义时代，即欧洲資本主义国家大規模对外实行殖民地扩張的时代。

在十九世紀中叶，英國的大社会学家亨利·湯姆斯·巴克尔(1821—1862年)出来为地理学派辯护。他在自己所著“英國文明史”一書中，极力証明社会发展对地理环境的依賴性，他认为地理环境中一共有四个主要的要素——气候、土壤、粮食和自然界的一般状况(*The General Aspect of Nature*)。照他看来，决定財富的生产和分配的那些条件，也就是决定着欧洲文化和非欧洲文化之間的差別的那些条件。此外，他同时也用上述这些因素来解釋社会的思想意識的发展，并把这种发展看作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

巴克尔曾經这样写道：“劳动本身的能力和正确性完全取决於气候的影响。”^① 他认为，財富的分配及其生产完全受自然界的自然規律的支配，而自然界的力最則是不可被战胜的^②。他武断地认为，正因为热带地区的自然特点使

^① 亨利·湯姆斯·巴克尔：“英國文明史”，聖彼得堡，1895年，帕夫連柯版，第17頁。

^② 同上書，第20—21頁。

这里的居民似乎比寒带地区的居民所需要的粮食要少一些，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热带地区的居民要比寒带地区增长得快一些。由此他得出結論，气候規律是通过粮食而同人口規律、从而也同財富分配規律相联系的。

巴克尔也和自己的前輩一样，認為寒带地区的居民，其性格要比热带地区的人民更为勇敢更富有事業心。他认为，这是因为在寒带地区的粮食中有着富含炭素的食品，而在热带地区的粮食中則有着富含酸素的食品。

巴克尔虽然避免用精神活动來說明历史过程，並为此目的而求助於物質原因(食物和气候等等)，但是他一方面却通过精神(如进取心、創造性和人民的良好性格 等等)来表述一切这些物質，并用这来解釋历史的过程，另一方面則极力用各种各样不正确的錯誤論点来替阶级的不平等和殖民政策辩护。例如，他曾这样写道：“上等阶级和下等阶级之間的正常关系主要取决於……自然界的特點。”^① 在另一处地方，他曾武断地指出，印度所以发生社会財富分配不均的現象是由於气候和食物的特点，由此做出結論說：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所以会遭到貧困的压迫，所以会“仍然处在难於想像的卑躬屈膝的情况並在接二連三的灾难的重压下弄得疲憊不堪”，是絲毫不足为奇的，因为他武断地认为，印度人民是由於不許抗拒的自然法則而注定要处在这种状况的。“这种法則的力量是如此地不可战胜，以致凡是这种法則发生作用的地方，这种法則就必然使这里的生产者阶级永远处在从属的地位。在任何一个热带国家中，当财富大量聚集的时候，人民逃出这种命运的事例在历史上是从来未曾有过的；同时热带气候不可能不引起粮食过剩，而粮食

① 亨利·湯姆斯·巴克尔：“英國文明史”，第27頁。

过剩不可能不首先引起財富的不平均分配，从而不可能不出現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①

巴克尔，这位十八世紀發展中的英國資本主義的思想家的地理理論，在后来乃成为替資产阶级“自由实业派”以及不列顛傳統殖民政策进行辯护的理論。

社会学中的地理学派在俄国資产阶级的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中同样也有自己的拥护者。

有名的俄国地理学家卡尔·埃尔恩斯特·貝尔院士(1792—1876年)在自己所著“論外部自然界对某些民族的社会关系和人类历史的影响”一書中曾經強調指出：“人民的命运是預先而且似乎必然要受当地自然界的制約。”^②他认为，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命运是預先受当地的自然特点决定的。並認為“全世界历史的进程当然更是决定於外部的自然条件。”

十九世紀中叶有名的俄国历史学家謝尔格·米海伊洛維茨·苏洛維也夫(1820—1879年)认为：“三个条件对人民的生活具有特殊的影响，这三个条件是：他所居住的这一地区的自然界，他所隶属的这一部落的自然界，外部事件的进程以及这个地区的周圍各民族所給与的影响。”^③他強調指出地理环境的重要性以后，又在另一处地方这样写道：“事件的进程經常受自然条件的支配。”^④

苏洛維也夫同时代的另一个俄国历史学家阿法納西

① 亨利·湯姆斯·巴克尔：“英國文明史”，第30—31頁。

② “俄国地理学会出版的地理爱好者手册”(彙編)，1848年，第210頁。

③ 同上。

④ 苏洛維也夫：“俄国土地的起源”，第761頁。

伊·帕羅柯皮也夫·沙波夫(1830—1876年)曾打算以“外部自然界和人类本身这一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的規律”为根据来研究历史。他认为：“人是自然形态的活的印迹。”^① 沙波夫特別強調气候的作用，肯定地认为：气候一方面决定农业方面的各种可能条件，从而也决定一个国家的开发情况，另一方面則决定着人們的性格特点。^②

俄国资产阶级历史地理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瓦西里·沃西波维奇·克留切夫斯基(1841—1911年)继承了苏洛維也夫的路綫，极力強調地理环境，特別是森林、草原、山、土壤和河流在社会发展以及在古代罗斯的发展特点上的作用。他曾武断地说道：“历史的发展是和自然条件十分一致的，河流往往給历史定出它的綱要。”^③

但是克留切夫斯基同样也很注重人类对自然界所起影响的意义。他曾經写到：“研究自然界对人类的影响时，也应看到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对人类文明虽然十分有利的地理条件，如果輕率地对待它，就会变成为人民福祉的阻碍。”^④

有名的俄国学者、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列夫·伊里奇·梅茨尼可夫^⑤(1838—1898年)是地理学派中的最偉大和最出色的代表人物。

① 苏洛維也夫：“俄国的历史”，第1卷，第13頁。

② “沙波夫全集”，第2卷，1906年，第158頁。

③ 克留切夫斯基：“俄国历史教程”，第1卷，彼得堡，1918年，第70頁。

④ 同上書，第77—78頁。

⑤ 遗憾得很，截至目前为止，在我国文献中还未出現一本用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这位出色俄国学者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观点的著作。如果除去布列合諾夫論梅茨尼可夫的著作不計的話，那么唯一的比較詳細的論述梅茨尼可夫關於社会發展和社会前进理論的文章要算是梅茨尼可夫这本書(1929年版)中的引言了，可是在这萬引言中含有許多無政府派的方法論上的歪曲。

梅茨尼可夫在他的主要著述“文明和偉大的历史河流”一書中，曾以丰富的实际材料为根据极力証明地理环境是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而且認為社会制度的性質正是由这种力量决定的。

梅茨尼可夫非常強調河流在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正如他所說“偉大的历史河流”）。他曾經写道：“依我看来，河流是文化誕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任何一个国度里，河流就像是这个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气候、土壤、地形和地質条件的有机綜合的表现”^①。

固然，古代社会在自己的活动中是和尼罗河、底格里斯河 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黄河、长江等“偉大的历史河流”具有着非常巨大的直接关系，这一点是沒有人怀疑的。但是梅茨尼可夫不仅只強調这一事实而且还走上了极端，他武斷地认为：作为“全部自然地理条件的綜合体”的河流，乃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梅茨尼可夫的論点中虽然犯了方法論上的錯誤，但是他曾經从古代民族的历史中引証了許多卓越例子来証明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影响的各种形式，来証明社会給地理环境所带来的变化。

应当指出：絕大多数对地理学派有或多或少貢獻的俄国学者並沒有从自己的地理学說中做出反动結論，並未出現仇視人类的种族主义傾向或者向外扩张主义的傾向。反之，甚至連俄国地理学家中最出色代表人物梅茨尼可夫，也公开而激烈地出来反对西欧学者的伪科学种族“理論”，他們把某些民族的經濟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看作是跟他們一成不变的种族特点分不开的，照西欧地理学派代表人物的意

① 列夫·梅茨尼可夫：“文化和偉大的历史河流”，1924年，第159頁。

見看來，这种种族特点乃是地理环境所起影响的必然結果。梅茨尼可夫在自己所写的書中曾用一整章的篇幅(第四章)說明这个問題，在这一章里他強調指出，自古以来根本就沒有什么“能干”种族和“不能干”种族之分，也沒有什么“特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以及“先進”种族和“落后”种族之分，一切种族都同样能够創造文化財产，在資产阶级的种族定义中当然並不具有任何一定的和科学的內容。^①

地理学派在德国傳佈得格外广，在德国地理学家的代表人物中間，具有特殊地位的是資产阶级人种地理学的創始人之一弗力德李赫·拉采尔(1844--1904年)，他的學說的許多方面曾被德国法西斯的地理政治学家所承繼並且成为此种伪科学的基础。

拉采尔在自己的許多著作中(如“政治地理学”，“人种学”，“人文地理学”，“地球和生命”，“作为地球上生命現象的人类”等一类著作中)，除了發揮了“种族”理論以外，还发展了自己的關於地理环境直接影响的“理論”，認為地理环境既决定国家經濟发展的水平，也决定該民族的政治制度的性質和該民族的文化发展程度。

拉采尔在所著“人种学”一書中曾这样写道：天生的懦弱似乎是农业民族所固有的特点，这种懦弱使他們失去勇敢和进取心。反之，以从事狩猎或畜牧为生的民族，就較为勇敢，較比富有进取心，較比灵活並且能够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这些民族似乎更为剛毅果断，更能掌握武器，但是从事农业的民族在自己的本性上却失去了这种特点。这是

① 地理学派在亞美尼亚的某些历史學家中間同样也有自己的支持者，他們对这个問題的許多看法同苏洛維也夫、克留莫斯基以及梅茨尼可夫等人的看法有很多相同之处。历史学家李奥的这种倾向表現得最为鮮明。

一种純唯心主义和純形而上学的觀点。拉采尔臆断地、完全脱离時間和地点地觀察“猎人”和“农民”。照拉采尔看来，中国和越南的人民由於自古以来就是定居的农民，因此他們似乎应当是懦弱的，是不能掌握武器的。但是事实上他們在把外国侵略者赶出自己国土的斗争上却表現得多么勇敢，多么“灵活”！

拉采尔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种族主义者，他不承认欧洲以外的各国人民有自己的文化。照他看来，他們至多只能接受欧洲的文化。

拉采尔武断地認為，任何一个民族的命运都受着土地、天空和动植物界的制約。土壤不仅向人民提供活动的場地，並且也向他們提供粮食，但同时似乎也是使他們聚居在一起或者向各处分散的决定因素，天空决定着給与他們的雨量和热量的多少，动植物界則向他們提供食料、衣着和裝飾品。拉采尔認為：“这个国家位於南半球，还是位於北半球，是處於世界的哪一部分，是位於半島上或是位於羣島上，是靠近海洋、湖泊、江河或者靠近沙漠，这一切都决定着历史的进程。”^①

下面这一段話不但包含着拉采尔關於人种地理臆造的全部精华，而且也最能表現出拉采尔的思想实质，他說：“如果某一个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並不具有大量的土地，那末他們最高的才能就必然最直接地在力求改善自己的地理位置上表現出来，也就是說他們必然极力消除內部的阻碍，改善对外的疆界，用侵占邻近土地的方法来增加

① 拉采尔：“人类是地球上的生命現象”，1901年，第102頁（重点是本書作者加的）。

自己的土地面积，和夺取远方的殖民地。”^①

照拉采尔看来，“努力把疆土的边界推进到最远地方的这种向外扩张的企图”乃是“最高度文化的标帜”^②。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在思想意识上支持了俾斯麦掠夺政策的拉采尔，曾在德国法西斯分子的思想家之中获得自己“光荣”地位并且被宣布为他们的“地理政治之父”的原因。

* * *

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时期，社会学中的地理学派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并且成为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思想武器之一。

大家知道，德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要比西欧其他国家为迟。在十九世纪最后25年的这个时期内，即当德国已基本上完成了向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转化的时候，整个世界差不多已经被那些在经济发展方面超过德国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诸如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美国等）瓜分完了。德国“来迟了”，没有分得一份，别的掠夺者捷足先登，只留给德国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但是德国的经济飞速地发展起来并且在工业的发展速度方面超出了自己的帝国主义对手。飞速发展起来的经济要求能有更多的新市场来销售自己的商品，要求能有新的廉价原料来源地，要求为资本的有利输出开辟新的可能性。这正是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所以会表现得如此露骨的主要条件，也正是这个事实滋养了殖民地掠夺的意图，滋

① 拉采尔：“地球和生命”，第2卷，第702页（重点是本书作者加的）。

② 拉采尔：“作为地球上生命现象的人类”，第96页。